

<<懒寻旧梦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懒寻旧梦录>>

13位ISBN编号：9787108025548

10位ISBN编号：710802554X

出版时间：2006-8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作者：夏衍

页数：45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懒寻旧梦录>>

前言

上了年纪，常常会想起过去的往事，这也许是人之常情。

六十岁以前，偶然碰到中学或大学时期的同学，或者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也不免会回想起青少年时期的事情，但除了1939年写过一篇《旧家的火葬》之外，从来没有写过回忆往事的文章，这主要是我很同意乔冠华的意见：写文章尽可能“少谈自己”。

我认真地回忆过去，是在1966年冬被“监护”之后，我记得很清楚，1967年5月1日，“专案组”的头目责令我在一星期之内，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传体的交代”，我如期写了三万多字，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就被叫去“问话”，那个穿军装的头目拍着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写过，要你写检讨，不准你替自己树碑立传。

，”我记得这样的“交代”前后写过三四次，后来才懂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要从“交代”中找到“外调”的线索，其次是想从前后所写的“交代”中找出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作为继续逼供的突破口。

这是一种恶作剧，但这也逼使我比较系统地回忆了过去走过来的足迹。

在这之前，我从来不失眠，也很少做梦；可是也在这个时期，一入睡就会做梦，奇怪的是梦见的都是童年时期的旧事，梦见我的母亲，我的姊姊，梦见和我一起在后园捉金龟子的赤脚朋友。

每次梦醒之后，总使我感到惊奇，事隔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梦境中的人、事、细节，竟会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详细！

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开杭州，久矣乎听不到故乡的乡音了，而梦境中听到的，却是纯粹的杭州上城口音。

当时写“交代”，目的是为了对付专案组的逼供，所以写的只是简单的梗概。

那时批斗猛烈，审讯频繁，既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假话，因为说真话会触怒“革命派”，说假话会株连亲友。

全国解放后，我经历过许多次“运动”，可以说已经有了一点“斗争经验”，所以我力求保持清醒，我的对策是宁可写违心的检讨，不暴露真实的思想。

真正能静下心来追寻一下半个多世纪走过来的足迹，反思一下自己所作所为的是非功过，那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

从1973年3月到1975年7月，我有了两年多的独房静思的机会，不是说“吃一堑，长一智”么，我就利用这一“安静”的时期，对我前半生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回顾。

这像是一团乱麻，要把它解开和理顺，是不容易的，要对做过的每一件事，写过的每一篇文章，分辨出是非曲直，那就更困难了。

任何人都有主观，任何人都会不自觉地替自己辩护，1966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革命小将”用鞭子逼着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可是经过了两年多的“游斗”、拳打脚踢、无休止的疲劳审讯，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一是，真的是应该“低头认罪”了，这不单是对淫威的屈服，也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压力，这就是对无上权威的迷信。

从“交通干校”转移到“秦城监狱”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恩典，准许看书了，准许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这时我的右眼已近失明，牢房里。

光照时间很短，我就利用上午光线较好的时间，选读了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关哲学和经济学的篇章。

在秦城读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受干扰，可以边读边想，边联系中国的实际。

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应该说过去已经读过不止一遍了，而这时候读，边读边联系过去几十年间的实际，才觉得“渐入佳境”，别有一番滋味了。

可惜这一段“独房静思”的时间太短了，1975年7月12日清晨，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即日解除“监护”。

我感到意外，但我还是冷静地对那个专案组的小头目说：“关了八年半，批斗了几年，要解除监护，得给我一令审查的结论。

”对方蛮横地回答说：结论还没有，但可以告诉你，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懒寻旧梦录>>

这时，和专案组一起来的对外文委的项明同志对我说，已经通知了你的家属，都在等着你，先回去吧，于是我就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

和阔别了多年的家人团聚，当然是高兴的，但在当时，大地上的黑云还没有消散，审查还没有结论，“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这表明我当时的身份依旧是“从宽处理”的“敌人”。监护是解除了，但“监视”则一直没有解除，我家门口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视，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个40年代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还向专案组和于会泳的文化部打过关于我的“小报告”。但我还是在压城的夜气中望到了光明，在炎凉的世态中感到了友情的温暖，在我回家的几天之后，首先来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承志的乐观，一氓的安详，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廖用两手按住我的肩膀，笑着说：居然还活着，这就好！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

春天来得很迟，严冬过去之后又碰上了春寒，1976年1月，直接领导过我几十年的周恩来同志去世了，得到了邓颖超同志的关照，我得到了向恩来同志遗体告别的机会，我这个人铁石心肠，很少流泪，这一天，我不仅流了泪，而且放声大哭了一场。

这又使我回想起过去。

说实话，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同志，我是逃下过1957、1959、1964年这些关卡的，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

我静下心来读书，读的主要是中国历史和党史。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齐燕铭给我弄来了一张内部书刊的购书证，于是我买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书，有中国人写的，有外国人写的，有同情中国革命的，也有敌视中国革命的，当然也买了一些过去不想看、不敢看的书，如变节者写的回忆录之类。

我没有浪费时间，从“天安门事件”之后到1976年秋，我一直闭户读书，从实出发，又回到虚，从看史书出发，又回到了哲学。

为了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想不通的问题，我又读了一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这本书我20年代就读过，后来又不止读过一次，可是现在再读，感受就很不一样了，这本书开始照亮了我的心，从辩证的认识论来回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才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人，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的对立面！

这就是公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

恩格斯说过：“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

”这里所说的对立面，不就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么。

恩格斯不止一次严厉地批评过教条主义者，他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不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把这一标签贴上去，以为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快地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

”——这是何等辛辣的批判啊！

从这些名言回想起我们30年代的那一段历史，这些话不也正是对着我们的挑评吗？

就在《自然辩证法》这本书中恩格斯还说过：“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

”我们这些人受到了惩罚，我想，我们民族、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惩罚。

1977年秋，我鼓起勇气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记得是请万里同志转送的），这样，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恢复了组织关系，也真巧，这正好是我的党龄满五十年的时刻。

在“文革”中批判我最厉害的是两件事，一件是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另一件是1935年至抗战前夕的“两个口号的论争”。

因此，我又认真地回忆和思索了“左翼十年”的往事。

对前一个问题，我的立场是站在“创造社”和“太阳社”这一边的，但当时我还不是“文艺工作者”，我没有参加这一场论战，这只要翻阅一下李何林编辑的《中国文艺论战》这一本书就可以查清楚的。

<<懒寻旧梦录>>

而第二个问题，则我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抗战初期已经有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这是革命文艺界的内部论争，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本来就不需要我们这些受过惩罚的当事人出来饶舌了，可是一方面“四人帮”遗毒还没有肃清，“文革”之前、之中和之后的许许多多不确切的、乃至有明显倾向性的记述和评论“左翼十年”的文章还在流传，甚至还写进了现代中国文学史教材，那么，为了让青年一代了解30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真实情况，我们这些来日无多的当事人似乎就有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具体情况、党内外文艺工作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尽可能如实地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和评说的责任。

“左翼十年”，指的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起至1937年抗战为止的十年，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的十年，现在，对于这个时期的国际风云，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消长起伏，身历其境的人已经不多了。

至于在这种复杂情况下领导和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的人，潘汉年、钱杏屯-j、茅盾、冯乃超、成仿吾相继逝世之后，幸存者已屈指可数，因此，在1980年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前后，朋友们怂恿我写一点回忆文章，我才动了写一本自传体回忆录的念头。

有人说我是世纪同龄人，其实，我出生于19世纪最后的一年，可以说已经是跨世纪了，从1900年到现在，八十多年过去了，我这个人很平凡，但我经过的这个时代，实在是太伟大了。

我看到过亚洲第一顶王冠的落地，我卷进过五四运动的狂澜，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我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我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蹒跚学步，迷失过方向，摔过跤，也受到过不尊重辩证法而招致的惩罚。

经过回忆和反思，特别是处身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时期，觉得我们这些人有把自己走过来的道路，经受过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的必要。

亲身经历过的，耳闻目睹过的记述，应该比辗转传闻和在历次运动中留传下来的“材料”真实一些，但我能够做到的，也只能是“力求”做到而已。

上了年纪的人写回忆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客观各方面的制约，一是记忆力远远不如往年，对几十年前的往事，大事情大概不会记错，具体的细节（时日、地点等等）就难免会有差错；二是“交游零落，只今余几”，过去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健在的已经不多，要核实或查对往事，只能从他们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遗著中去寻觅了；三是记事离不开论人，这就还有一个该不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问题。

这本书是从1982年暮春开始动笔的，断断续续地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中间动笔写的时间比较少，大概只占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搜集和查核各种各样的资料，对此，唐搜、丁景唐、方行、常君实、李子云、黄会林等同志帮了我很大的忙，出了不少的力，有一些我自己已经记不清楚的事，还承内山嘉吉、阿部幸夫两位日本朋友给我提供了线索和资料，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写这本书难度最大的是第四章“左翼十年”，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两次文艺论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之外，的确也还有一个哪些该“讳”、哪些不该“讳”的问题。

这一章写完之后，曾请几位“左联”战友和现代文学史家提过意见，作过几次修改，但就在这个“讳”的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

有的同志说：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不说也罢，说了会使当事人（或他们的子女）感到不快；也有人说：你不是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逝去了的贤者”么，明知其有，而加以隐讳，也就是失真。

惊涛骇浪的“左翼十年”中，这一类事是不少的，我们对穆木天的误会，就是一个例子。

1936年9月，郑伯奇和穆木天去看望过鲁迅先生，这件事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吧，但这是查核无误的事实，不仅郑伯奇和当时在场的鹿地亘和我谈过，穆木天自己也在1946年出版的《诗的旅途》中写过，因此，我认为讳言这一类事，对含冤去世的故人是公道的。

那么是不是已经把我知道的“内情”完全记下来了呢？

那也不是，举凡涉及个人私德和政治品质的事，我还是尽可能避开了的。

清人章学诚说：“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

“我以为这是一条应该自律的原则。”

<<懒寻旧梦录>>

也正是写完了“左翼十年”这一章的时候，李一氓同志送给我一副他写的集宋人词的对联：“从前心事都休，懒寻旧梦；肯把壮怀消了，作个闲人。”

我非常喜欢，就把上联的后句作为这部回忆录的书名。

1984年冬

<<懒寻旧梦录>>

内容概要

被称为“世纪同龄人”的夏衍，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作为20世纪中国诸多文化、政治事件的亲身参与者，夏衍在八十四岁高龄开始撰写的这部自传体回忆录，为世人提示了半个世纪间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电影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而丰赡的史料，其中关于“左联十年”的记述，尤为文坛所关注。名场历尽的老人，心史纵横，懒寻旧梦，刻意反思，显得劲节清操，老而弥坚，令人悠然神往。

<<懒寻旧梦录>>

作者简介

夏衍（1900-1995），浙江杭州人。

作为现代著名作家和革命文艺活动的领导人，作者在84岁高龄开始撰写的这部自传体回忆录，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为世人揭示了近半个世纪间许多重要的历史侧面，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电影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而丰赡的史料。

其中，关于“左联十年”的

<<懒寻旧梦录>>

书籍目录

自序 一家世·童年 二从“辛亥”到“五四” 三心随东棹忆华年 四左翼十年(上) 1. “四一二”之后的上海 2. 革命文学论战 3. 筹备组织“左联” 4. “社联”、“剧联”等的成立 5. 五烈士事件 6. 《文艺新闻》及其他 7. 歌特的文章 五左翼十年(下) 1. “一二八”之后 2. 进入电影界 3. 阵线的扩大 4. “左联”的后期 5. 三次大破坏 6. “怪西人”事件 7. 重建“文委” 8. 萧三的来信 9. 两个口号的论争 10. 在大的悲哀里 11. 西安事变 12. 从“七七”到“八一三” 13. 郭沫若回国 六记者生涯 1. 上海《救亡日报》 2. 广州十月 3. 广州最后之日 4. 从广州到桂林 5. 香港《华商报》、《大众生活》 6. 《新华日报》及其他 7. 《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 8. 香港《华商报》、《群众》 七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附录 新的跋涉《武训传》事件始末

<<懒寻旧梦录>>

章节摘录

二 从“辛亥”到“五四” 也许是通了火车，乡下人的消息灵通些了；也许是我长了年岁，懂事了，这时我才知道了杭州这个地方也还有日本人、英国人。

当时有不少日本人住在拱宸桥，开丝厂、卖西药，“仁丹”、“中将汤”的广告，一直贴到了严家衡。

我不知道当时的拱宸桥是不是租界，反正乡下人把它看作一个又奇怪又可怕的地方。

就在火车开通那一年，拱宸桥发生过一次日本人和丝厂工人的哄斗事件，严家衡的小伙子们也摩拳擦掌地说要去打“东洋人”。

至于杭州还有英国人，那是有一次我生了伤寒病，李家二姑母来看我，说大方伯有个英国医生，叫梅滕根，会说中国话，不妨去看看。

但是我害怕，母亲也说伤寒这种病只要小心养养就会好，不宜多吃药，这样，尽管没有看到，我才知道了杭州有个英国医院。

我生伤寒是在夏天，母亲主张的“好好的养”，主要是只准我吃素菜，特别是禁吃鱼虾（在乡下，乡下人难得吃到肉，但是小鱼和虾，是可以很便宜地从乡下孩子手里买到的）。

病后正值秋天，于是每天吃茄子、葫芦、冬瓜，连续吃了几个月，我就对瓜类发生了反感（也许医学上叫过敏吧），一吃瓜就呕吐、腹泻。

这样，从幼年到六十几岁，我一直不吃瓜，包括宴席上的冬瓜盅，在朋友问传为笑谈。

直到“文化大革命”，“监护”中天天给吃窝头和西葫芦，不吃也得吃，勉强一下，居然也不再“过敏”了。

1911年（辛亥），我十一岁，不上学，一直在家里读“闲书”，看《天雨花》、《再生缘》之类，母亲也不反对。

这一年夏天，表兄李幼甫送给我几本油光纸印的《三国演义》，一下子入了迷，连每年夏天我最欢喜干的事：捉知了，捉纺织娘，养金铃子之类也忘记了。

可是一到秋天，忽然间连严家衡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也紧张起来了。

这一年的农历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赶走了总督瑞澂，武汉“光复”了！

因为这正在中秋节之后，所以很快就传出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反满口号。

我记得那时流传得最广的一本书是《推背图》，老百姓说，那是“明朝的诸葛亮”刘伯温写的。

我没有看到过这本书，但是我每次走过邬家店门前，都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议论《推背图》上说的“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这两句话。

他们说九十九就是一百缺一，百字去了一，就是白，因此革命军挂的是白旗。

大概在旧历九月初，母亲接到我舅父的急信，意思是说杭州是省会，革命党可能会“起义”，有危险，要我们到德清去避一避。

这样，母亲带着四姊和我坐“脚划船”去德清，住在我舅父家里。

舅父徐士骏是一个曹禺的《北京人》里的曾老太爷式的人物，表面上治家极严，我的表兄嫂们见了他，真像老鼠见猫一样；可是在这一个大家庭中，各房之间勾心斗角，乃至偷鸡摸狗之事，在我这个十来岁的孩子眼中也看得出来。

只是尽管有这种矛盾，舅父对我们一家却非常宽厚。

我们到德清之后不久，旧历九月十四日，杭州新军起义，逮捕了巡抚增韞，推举了本省“耆绅”汤寿潜为都督。

过了一天，江苏也挂起了白旗，宣布独立。

这样，地处江浙之间的德清这个小县城里也热闹起来了，绅商头面人物在“明伦堂”开会，胆小的有钱人则把细软转移到乡下，谣言很多，青年人就跟着起哄，这时候，就发生了我的剪辫子事件。

有一天，我表兄徐景韩逗我，说：“杭州开始剪辫子了，你敢不敢？”

我负气地说：“敢。”

于是他就拿出一把大剪刀，剪了我的辫子。

可是当我高兴地拿了尺把长的辫子给母亲看的时候，意想不到地引起了她的暴怒。

<<懒寻旧梦录>>

当时杭州虽已独立，但是连当了都督的汤寿潜也没有剪辫，因此抢先剪掉辫子，分明是很危险的事了。

她拉着我向我舅父“告状”，舅父是“场面上人”，家里出了这种事，对他当然是不利的，于是，除了将景韩痛骂一顿，罚他下跪向我母亲请罪之外，还命令我从今以后不准出门；后来又找出一顶瓜皮帽来，把剪下来的辫子缝在帽子里面，逼我戴上，装作没有剪掉的样子。

这一场风波一直到旧历十月底，清朝政府批准资政院请求，发布了“准许官民自由剪发”的命令之后，才算告一段落。

我记得我们一家是旧历过年之前，也就是“宣统皇帝”下诏退位（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后，回到杭州的。

临行之前，舅父和我母亲谈好，过了新年，让我到德清来读书，这里有一所县立高小，舅父是校董之一，和校长曹绪康很熟，可以不必考试。

这一年春节我过得特别高兴，因为我是严家衡惟一剪了辫子的人。

现在回想起来，习惯势力、旧事物、旧观念，实在太顽固了，读过或者看过《桃花扇》的人都知道，在明末清初，蓄辫意味着向“异族”投降，而现在经过了三百年之后，要剪掉辫子，反而成了一场不小的思想斗争，老百姓是不敢——或者说不愿剪辫子的。

大概是民国元年（1912）的元宵节，听说城里在剪辫子，我就跑到庆春门去看热闹，果然，有四五个臂上挂着白布条的警察，有两个手里拿着大剪刀，堵在城门口（当时杭州还有很厚的城墙），农民出城，就被强迫剪掉辫子，那情景十分动人，路旁的一只大竹筐里，已放着十来条剪下的辫子。

我赶到城墙边的时候，一个老年农民正跪在地上哀求，但是一个警察按住他的脖子，另一个警察很快地剪下了他花白的辫子，老农放声大哭，而一群小孩子则围在警察身边起哄。

这次剪辫风潮闹了十来天，后来农民索性不进城了，市场上买不到蔬菜，于是强迫剪辫的办法才告停止。

其实，这是庸人自扰，因为在这之前，“皇帝”已经下命令，准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过了年，母亲就送我到德清去读书，我进了德清县立高等小学，走读，住在舅父家里。

这是一所比较正规的学校，有学生五六十人，校址是在孩儿桥北，明伦堂左侧。

明伦堂是祭孔的地方，房子相当大，凡是本县出身的人考中了状元、探花、榜眼，这里都有一块匾，写着“状元及第”及某某人在某某年中式之类的字样。

有清一代，德清出过几个状元，老师告诉我，最后一个状元是俞樾（曲园），——就是俞平伯先生的曾祖父。

我在这里念了三年半书，到民国三年（1914）夏季毕业。

在学校里，我谨言慎行，算是一个好学生，毕业考试名列第二。

还记得考第一名的叫邱志高，是我的对手也是好友，第三名是蔡经铭，是我嫂嫂的弟弟。

德清离杭州不远，坐航船只要七八个小时，所以我每年寒暑假都可以回家。

辛亥革命那一年，我大哥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参加了“革命党”，在陈其美部下当了一名“庶务”。

可是二次革命失败，他就被遣散回乡，成了家，有了孩子，家境就更困难了，打算卖“坟头树”，和母亲吵架。

就在这个时候，大哥经过了这次“革命”的冲洗，显得也关心时局了，他偶尔也从城里带回一份《申报》，告诉我一些时事，什么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以及奥国皇太子被刺引起了世界大战等等，都是从他口中知道的。

我高小毕业，回到杭州，正是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年。

尽管那时还小，可是在乡下，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

因为在小学的时候，就听老师和同学讲过日本明治维新和光绪变法的故事，记得我还从表兄徐景韩那里看到过一本叫《亡国恨》的唱本，讲的是印度、朝鲜亡国的故事。

其中说，当了亡国奴之后，三人不得同行，三家合用一把菜刀之类，文字通俗，颇有煽动性。

加上欧战开始之后，日本借口向德国宣战，很快就在山东登陆，占领了青岛。

这样，连我也觉得亡国之痛就在目前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东阳县农民为了反对耶稣教会的洋人占用民田，引起了官逼民反，“暴民”烧毁县

<<懒寻旧梦录>>

署的事件。

我实在憋不住了，趁一个进城的机会，到后市街李家找表兄李幼甫去打听消息。

见面谈了几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许是他消息灵通，坏消息听多了，不以为意，也许是笑我这个毛孩子大惊小怪，他笑着说：“那么你说，怎么办？”

”我说：“你看会亡国吗？”

”他还是一本正经：“谁也说不定，康有为不行，孙中山又不行，老百姓有什么办法？”

”我有点火，顶了几句，他却邀我去游西湖，我拒绝了，他说“不去也好，我怕你学陈天华！”

陈天华你知道吗？

他主张革命，可是，他后来感到失望，一气之下，跳海死了。

你不会跳西湖吧！

”说罢大声笑了。

这次谈话毫无所得，也许可以说，反而增加了我的迷惘。

这次进城假如说有收获的话，那是从幼甫书房里借了几本一直想看的书，一本是《古文观止》，另一本是《鲁滨逊漂流记》，他还送给我一部《文选》，可惜我那时还读不懂它的好处。

1914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

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连母亲的几件“出客”衣服和一床备用的丝棉被也当掉了。

可愁的事，当然更多了，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而袁世凯则一心想做皇帝，连外国客卿也向他递了劝进表。

至于我自己，小学一起毕业的同学，大部分都进了中学，而我，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

晚上，我坐在床前，凭着豆油灯的微光看那本《鲁滨逊漂流记》，忘了时间，忽然听到母亲在被窝里饮泣的声音。

我赶快吹灭了灯，偷偷地睡下，可是怎么也睡不着。

这样下去怎么办？

想了又想，什么主意也没有，想翻身，想哭，怕惊醒了母亲……。

这是冬天，夜特别长，朦胧了一阵，天亮了，终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

十五岁，是可以做工的年岁了。

P11-15

<<懒寻旧梦录>>

编辑推荐

被称为“世纪同龄人”的夏衍和茅盾一样是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大作家。

夏公的生命档案里装着半部中国现代史、半部当代史，历经磨难，久经考验，堪称阅尽人间沧桑。

这部《懒寻旧梦录（增补本）》是在他八十五虚岁的迟暮之年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用十个字概括“赤心写赤史，青松挺且直。”

”这就是夏公一生的写照。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诸多文化、政治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参与者，夏公的一生既是一个文化人的不平凡的一生，又是一个老共产党人传奇式的一生。

<<懒寻旧梦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